

五四在香港的百年發展

陳學然*

摘要

本文主要說明國家的五四進入地方而有其在地化的發展後，便會形成一個帶有地方特色的「五四」。在地的五四既可以是與國家的五四遙相呼應，但同時也可以是反國家的五四而行。五四在眾聲喧嘩中所呈現的繽紛多姿面向，實際上透視了不同思想背景的人在對百年中國發展的不同角度及不同層次的反思與展望。以五四在香港為例，透過五四百年的在地發展歷程中，讓人看見了不同政治力量的大歷史敘述、不同時期南來知識社群藉五四以抒發其種種感時憂國之情，當然也更可以從五四的思潮流變裡看見不同時代的精神病痛。五四運動之於在地知識社群而言，是他們瞭望國家民族何去何從的精神燈塔。五四作為現代中國歷史之起源，它的周年紀念成為了知識社群為故國招魂的思想場域。在這點上，過去如此，在可見的將來恐怕亦復如是。

關鍵詞：國家的五四、地方的五四、香港、時空差異、在地化發展

* 作者現為香港城市大學中文及歷史學系副教授。

May Fourth in Hong Kong:

A Centennial Retrospection

Hok-yin Chan^{*}

Abstract

Memory is fluid and selective. In this essay, I examine the complex process by which the memory of May Fourth was absorbed, appropriated, and reconstituted in local discourses. Even though the historical events were the same, the local remembrances of May Fourth varied from place to place because of local needs. A case in point is the May Fourth memory in Hong Kong. Over the last hundred years, the May Fourth—meaning both the political protest in 1919 and the cultural renaissance from 1917 to 1927—had been remembered in different ways depending on who was remembering, what was remembered, and how the memory was presented. In comparing these different remembrances of May Fourth, I highlight the complexity in Hong Kong society. As different groups of the educated elite relocated to Hong Kong from mainland China, they evoked different images of May Fourth to define their roles in their adopted city. Some saw themselves as migrants in transit; some as protectors of

^{*}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and History,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the Chinese culture when iconoclasm took root in mainland; some as advocates of democratization and confrontational politics similar to the protesters in 1919. Whatever roles they might assume, they remembered the May Fourth to express their visions of China, their identities in local community, and above all, their goals in life.

Keywords: national May Fourth, local May Fourth, Hong Kong, time-space difference, localization

五四在香港的百年發展^{*}

陳 學 然

一、時空差異：國家的五四與香港的五四

五四運動是因應一戰後巴黎和會談判山東權益歸屬的問題而起；當時以英、法、美、義、日五國主導下，把戰敗德國在中國山東的權益轉交給日本。列強犧牲中國的權利、公然欺侮中國的外交交易，激發了中國學生團體的強烈民族意識、國族身分認同與愛國情懷，掀起了以「外爭主權、內除國賊」的學生愛國運動，更在工商各界的聲援下觸發全國性的罷工、罷市、罷課的「三罷運動」，迅速幅射至國內各大城市。本文所關注的一個問題是，已被學界定調或被普遍看作是在百年來影響力無遠弗屆的五四運動，它到底有沒有波及至遠離政治文化中心的北京、上海的南方小島——香港？

從國家的五四到「地方的五四」，由於地域空間與文化差異，基本上是沒有一種完全相同的五四；同樣，因為五四運動所牽動的是國

* 本文是香港研究資助局撥款資助項目：「金文泰與香港社會文化的發展（1925-1930）」（計劃編號 GRF-11605017）及「香港私立專上院校發展探微：1950-1970 年代」（計劃編號 GRF-City University 11617116）的部分研究成果。謹向該局致謝！同時，作者十分感謝評審先生對文章給予中肯和很具啟發意義的修改建議！此外，本文之撰寫，部分觀點最早見於專著《五四在香港：殖民情境、民族主義及本土意識》（2014 年），今藉東京大學「長時段及東亞歷史視野中的『五·四』：百年紀念研討會」（暨第 69/70 屆以文會，2019 年）舉辦之時機，對相關觀點與未觸及的問題再輔以新材料的情況下，繼續拓深探究五四與香港的百年關係。

人的民族主義情感以及對於社會不公與舊傳統的反抗，國家與地方之間當然也不會出現一個截然不同的五四。那麼，在國與家之間、中央與地方之間，所看待的五四便有其同一性與統一性，但必然也有其因為地理、社會文化空間的差異而出現斷裂性與差異性。

一般來說的五四，它既包括了1919年5月4日爆發的政治性的學生愛國運動，同時也包括了1927年自胡適（1891-1962）、陳獨秀（1879-1942）高倡〈文學改良芻議〉、〈文學革命論〉以來，直至1927年北伐以前的一段在文學、文化乃至社會政治上革新的思想運動。五四在近代中國史上如何影響深遠、如何巨大之類的陳述，又或者是「自從五四以來」這樣的特定模式陳述，充分反映了國家層面的一套大五四言說早已是其來有自。但是，一個有國家層面而沒有擴散到地方層面，或者是於普通人民生活世界沒有引起迴響的運動，它是否足以說得上已是影響力無遠弗屆？如果說有，那麼它是如何擴散的？如何構成的？而這種在地方裡的運動，它的形態、模式與國家的又有什麼不同？它們的區別又在那裡？這些問題，是五四百年紀念裡值得我們追問和研究的課題。

我們相信，國家文化中心的政治氣氛，以及所在的知識界、商界等等構成的市民社會，肯定是與地方的有很大的不同。那麼，本來內涵就十分複雜的五四，其進入不同的地方過程中也必定因為在地的複雜社會環境而有各種不同的面向與發展歷程。因此，五四的在地化發展，不論是啟蒙的、還是救亡的；不論是政治層面的，還是新文化層面的；又或者是廣義的、甚至是狹義的，它們都不一定能夠與發源自北京的，甚或是由後來國家機器所制定的五四圖景毫無差別地相同看待。準此，五四在英國殖民地的香港也自然異於國內任何一個大城市的五四。

當然，諸如五四在上海、五四在廣州甚或五四在湖南、五四在成都、在哈爾濱、在雲南，不論地域距離北京有多遠、文化有多落後，又或者是管治地方的政權曾有多麼頻繁的更替變革，但所在的地方畢

竟還是中國境內的地方，管治者同樣是中國人，中央與地方的政治體制——相比於香港，彼此之間終究差別不會太大；再加上思想型態在中央集權的國家行爲下，地方與中央不太容易因爲空間距離、時間差別而出現太殊異的問題。儘管如此，我們還是可以看到五四運動爆發後一段時間裡，國家、地方之間生活世界變化如何不一致的對照。¹那麼，五四運動之於香港，其發展情況異於國內其他城市的發展步伐、異於國家的五四的面向，於此我們大概會有個初步的印象了。

香港自 1842 年以來，便逐漸成爲英國殖民地，並逐漸告離母國而奉英國爲其宗主國。直至 1949 年，香港居民可以自由穿梭陸港，但他們在生活層面上所接受的是英美法律體系，而中國則是沿用歐洲的大陸法律體系。香港市民的生活世界雖然深受傳統中國文化影響，但在港社會謀生或社會生活層面上的種種活動，難免受殖民地法規、處事方式影響而有異於「祖國」，構成了香港在家國門外的異域文化薰染。因爲這些政治司法制度、文化習染之異，使香港不但在地理空間上遠離國內的中心而處於國家的邊緣位置，更因爲這種種差異而在客觀時間上與心境或思維上追不上中心地區的新文化發展。這種「追不上」，在清末民初那個改朝換代、社會秩序分崩離析而一切思想價值需要重新組合的年代裡，也許不適宜簡單化地說明後進者是如何地落伍與頑固、保守；不同思想型態的人，基於自身文化信仰或對國家政權均有其屬於個人的、自主的看法。那個時代，在國民黨未改組、未聯俄容共之前，仍然是各種政治意識、問題與主義相互競逐而未至獨尊一家的思想多元時期。

在早期的香港，因其自身歷史因素，在社會空間、時間的發展上都難與國家保持同一步伐。眾所周知的是，香港有一百五十年的英國殖民史經驗。在這百年殖民情境下，此地的政治體制、社會文化以及人口結構等等都會大異於國內任何一個城市。再加上香港作爲英國在

¹ 王汎森：〈五四運動與生活世界的變化〉，《二十一世紀》第 113 期，2009 年 6 月，頁 44-54。

遠東的一個商貿轉口港城市，同時也是華南一帶居民避難的首選地方，均塑造了這個地方的移民城市或難民聚居的社會特質，而高度的流動與多變形貌，便是這個城市的特性和「本命」。²

香港社會是由中國國內大小城市不斷湧來的各階層人口組成；上層社會主要由一批早年以買辦身分致富的商賈、辛亥革命前後避難香江的士紳與前清遺老構成。這些人心裡大多都不認同中國的大小變局，南來香港而欲求殖民地政府多加庇護。³ 他們就是魯迅（1881-1936）在〈再談香港〉一文裡所口誅筆伐的高等華人。然而，這不等於說這批高等華人是愛國的。他們不認同北洋政府或國民政府，不等同於他們不認同中華文化。相反，他們都有極其強烈的國族認同感以及在生活世界中處處表現出文化民族主義與保守主義，他們都有自身恪守的精神價值與信守不移的傳統文化信仰。當然，他們在中國境外的小島上生活，無疑也善於因時制宜地與殖民權勢協力，成就自己乃至香港的身分特性——「輾轉於無常的政經文化因素間」，以多變成就當中屹立不變的身分屬性。⁴

魯迅1927年來香港演講，自言遭到當局刁難，對香港印象極差。回國後不忘寫下文章對香港的人與事譏刺一番：「中央幾位洋主子，手下是若干頌德的『高等華人』和一夥作偽的奴氣同胞。此外即全是默默吃苦的『土人』」。⁵ 香港所呈現於魯迅眼前的是與他長期居住的北京、上海等中心城市在文化空間、歷史發展時間頗不一致的文

² 王德威：〈香港——一座城市的故事〉，《如何現代，怎樣文學？》（臺北：麥田，1998年），頁280-281。

³ 其中一個典型的事例便是，1927年漢口事件中，英國在漢口、九江的租界被中國強行收回，香港紳商反響極大，憂懼香港將步漢口、九江之後塵，因被中國收回治權而影響他們的身家性命，於是連袂請求港府出面，向英國政府轉達訴求，確保香港不會交還給中國。見 Personal Letter, Sir Cecil Clementi to L. S. Amery, 26th March, 1927, Papers of Sir Cecil Clementi, Box 19/File 3。

⁴ 王德威：〈香港——一座城市的故事〉，頁280。

⁵ 魯迅：〈再談香港〉，《魯迅全集》（香港：香港文學研究社，1973年），第3卷，頁406。

化景象，使其充滿時空錯置之感。的確，香港較難擁有類似於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所謂現代性學術團體，也欠缺現代性的某些公共空間。⁶然而，香港之獨特性就在於它與國家不是處於同一時空下，反使它充滿種種的可能性。在國內新潮高漲之世下，香港在地社會菁英仍然秉持著「海濱即是鄒魯」的傳統文化觀念與賡續道統的淨土。⁷更被看作是一個可以「漫說」理想的「奇妙空間」以及阻隔中國的反清、反傳統浪潮的「世外桃源」。⁸

遺老們堅持著「民國乃敵國也」的政治信念，他們這群人就如論者所言：「在民國建立後，對遜清宗室仍舊懷抱忠誠的態度」。其次，他們「相當反對民國的政治體制……內心厭惡民主共和的政治理念與價值」。⁹他們滯港以來書寫的不少詩文，大多都在排遣對於舊朝故主的黍離之悲。陳伯陶（1855-1930）便曾悲情洋溢地道出流亡香港後的心境：「生不逢辰聊避世，死應聞道且窮經」。俞叔文（1874-1959）談及身處香江時亦有其強烈的思域懷古的惆悵：「香江疑是管遼東，邂逅偏逢異地翁，故國河山空隕涕，異方身世感飄蓬」；何藻翔（1865-1930）則進一步慷慨道明避世香江而心戀故國的一片壯志：「遺老不餓死，貳臣還破家，聲名甑瓦裂，富貴空曇花。」¹⁰

遺老們是一群新中國下舊時代之人，他們在家國邊緣上徘徊或固守文化信念與批判新政權，抒發出強烈的去國懷鄉、感時憂國的心

⁶ 相關論述對香港的批評，另見拙著：《五四在香港：殖民情境、民族主義及本土意識》（香港：中華書局，2014年），頁170-172。

⁷ 賴際熙的原話是：「從此官禮得存諸域外，鄒魯即在於海濱，存茲墜緒，斯民皆是周遺，挽彼狂瀾，其功不在禹下。」見氏著：《籌建崇聖書堂序》，收於賴際熙撰，羅香林輯：《荔垞文存》（香港：學海書樓，2000年），頁32。

⁸ 趙雨樂：〈宋王臺——前清遺老的史跡追尋〉，《近代南來文人的香港印象與國族意識》（香港：三聯書店，2016年），頁162-163。

⁹ 林志宏：《民國乃敵國也：政治文化轉型下的清遺民》（臺北：聯經，2009年），頁27。

¹⁰ 相關引文轉引自區志堅：〈發揚文化、保全國粹：學海書樓八十年簡史〉，《學海書樓八十年》（香港：香港學海書樓，2003年），頁17。

情，由此又凸顯了香港在地與故國的時空差距、社會文化的思想殊異。當我們批評在港前清遺老、紳商舊宦如何落後、保守與迂腐時，倒不如說他們在別有所選的時空下洞燭出天下之大勢，但能自足於他們所延續的傳統生活世界，進而在自別於中國大陸的華人異域繼續心存弊絕風清的抱負。居港遺老中的代表人物賴際熙（1865-1937）的那句「海濱即是鄒魯」名言，無疑為香港一域塑造了新的身分、新的文化價值與社會意義，讓本來被「長毛狀元」、晚清思想家王韜（1828-1897）痛批為「蕞爾絕島」的香港，被重新賦予上極其重要的文化內涵與天降使命，從國家、皇朝的邊緣地極一變而成千年文化傳續不斷的「中心」。香港這個既傳統、保守但又繁榮安定的現代化城市，從此成為一個可以讓不同背景的人在這裡找到安身立命之所和重建人生志業的希望。

相對於被遺老看作是赤焰滔滔的大陸，又或者是國民黨北伐勝利以來黨國體制下，他們眼中所見的就是民間宗教信仰給消滅、廟產和地方資源被悉數沒收，政治無孔不入地侵擾尋常百姓的處境和與民爭利，肆意增加政府財政來源，造成絕大多數中國人的生存權益被少數人基於自身權利而剝削掉。現代性下的「民族國家」和政黨政治、民眾動員的政治運動說白了就是一場場咄咄逼人的權力鬥爭。¹¹ 可以毫不誇張地說，由晚清過渡至民初的時代大轉變、大決裂，在他們眼中是傳統中國文化倫理的徹底變化和價值重構，造成了大規模的民間反抗和抵制。事實上，從不少著作裡，也可以看到1920年代的中國是躁動不已的。正如蔣夢麟（1886-1964）在《西潮·新潮》一書，便把1920年代的中國社會說成是「這裡鬧風潮，那裡鬧風潮，到處鬧風潮」的「擾攘不安」時代。¹²

¹¹ 杜贊奇著，王寵明譯：《從民族國家拯救歷史：民族主義話語與中國現代史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年），頁88-98。

¹² 蔣夢麟：〈擾攘不安的歲月〉，《西潮·新潮》（長沙：岳麓書社，2000年），頁138。相關詳細論述，另見陳學然、韓子奇：〈金文泰治港時期的政學商互動及其對五四新潮的排拒〉，《新亞學報》，2019年3月通過刊登。

上述種種自五四新文化思潮以至社會上各種思想爭競、政黨政治鬥爭、軍閥混戰等等造成的社會失序和擾攘不安情形，是辛亥革命以來又或者可以說是五四新文化運動席捲中國以後，呈現於國人眼中的社會現實問題。驟眼所見的社會問題，不一定是形形色色的「現代性」追求所致，但也是舊傳統被破壞而新人倫秩序與社會制度未得以確立的社會現實。當中國大陸五四新潮於1917年起勃興至1927年北伐戰爭的十年裡，既是近代史上最多元但也最混亂的時代——府院之爭、張勳復辟、護法戰爭、直皖戰爭、直奉戰爭等等，十年間基本上是軍政強人混戰、地方割據而民國賴以建立的共和理想徹底破滅的局面。1920年代的中國很快地從晚清十數年的「眾聲喧嘩」、¹³ 多元共進的多聲道進入了各種二元對立的絕對化時代、主義時代。國家政權無孔不入地侵進各個領域，構成了淹沒個人的威權時代。¹⁴ 那麼，一代代不認同國內政治環境、社會思潮的人南來香港，他們在香港找到一種異於國家的社會文化空間的同時，也重新體驗到一種似曾相識的舊日時光。與之同步發展的就是，香港的獨特社會文化氛圍與思想特性，在上世紀絕大部分時間與中國大陸都不是處於一個相同相等的時空裡，形成了國家性與地方性的種種差異。

回頭再來看看香港，這個居住了近95%華人的社會裡，南來的前清遺老縱然不一定能夠重拾昔日在位時的風光生活，但他們在思想精神的生活上相對於大陸而言，自覺是滿意和充實的。借用論者的話

¹³ 有關晚清思潮的混沌性、多元性與開創性，王德威從晚清文學的角度為我們揭示出晚清推陳出新、千奇百怪的蓬勃發展、眾聲喧嘩現象，進而談及了現代性追求在五四反受壓抑的現象。由此觀之，現代性隨著時間的推移不一定是呈現更開放、更多元的視野，也不一定會是更自由的思想價值的體現。王德威：〈沒有晚清，何來五四——被壓抑的現代性〉，頁23-39。

¹⁴ 王汎森在其研究裡指出從晚清過渡而至1920年代的「新人」，是如何一步步地「走向一種更強的集體性」、「擁抱主義」，致使進步的青年最後因為尊崇主義、服從紀律與改造社會的理想，最後失去了自我的結局。王汎森：〈從新民到新人——近代思想中的「自我」與「政治」〉，《中國近代思想史的轉型時代》（臺北：聯經，2007年），頁200。

來說，一群自北而南的遺老，他們相繼來到香港後，努力地對香港進行集廟、碑、史於一體的地方史重構，使這個由英國殖民者管理之地從此告別「逃難」、「流亡」的標籤，成爲了「延續中原政治道統的一個南方座標」。¹⁵

職是之故，在香港一隅觀察五四的在地發展，其異於五四在中國的其他城市發展的差異性也就不言而喻了——在國內大行其道的五四新文學、新文化不必然在香港引發什麼樣的風潮甚或影響力。進一步說，如果一定要在香港找到一個完全等同於國家的五四運動，那就無異於緣木以求魚。當然，反過來說，一定要說國家的五四與香港是絕緣的，或者是說彼此之間毫無關連性，則又必然會是忽略了香港與廣州一衣帶水的關係，甚或忽略了香港居民在上世紀前半部時間裡可以在港陸之間南上北下、東遷西移的自由往來經驗。再進一步來說，我們也必須認識到但凡在中國大陸發生的任何事情，都會影響著香港的變動與發展。陸港之間國與家的彼此時空發展差異、香港「僑民」毫無異議的自我國家身分認同以及在面對殖民地不公所產生的民族意識、民族主義，鑄就香港社會思潮流動不居、變化萬千。由此，所見之五四在香港，也就形態多端、面相紛呈，不同的年代均能見出不同面相的五四，並且折射出不同的家國在地因緣。

以五四運動作爲觀察百年陸港關係的視角，首先就在於它本身是一場活的歷史，它的不斷發展恰好是緊隨著國家的時局轉變而在空間上、時間上不斷地發展、流變。它在一爆發便成爲研究對象或詮釋者競相擷取的思想資源，在發揮著巨大的時代批判力以及促進著國家時局的發展進程的同時，它反過來也在不斷地模造、重塑五四的精神價值與思想面貌。同時，從國家層面擴散到全國每個角落，它也根據地域文化、社會環境的不同而有不同的發展型態。透過五四運動「在」香港的研究，正可以有一個歷史的視角來觀察「國」與「家」或國

¹⁵ 高嘉謙：《遺民、疆界與現代性：漢詩的南方離散與抒情》（臺北：聯經，2016年9月），頁342-343。

家／中央與地方，彼此之間在地理上、文化上或時間發展上的空間差異。藉著這場影響中國歷史巨大的學生運動、歷史大事件如何在香港的發展，從而思考國家與地方的問題，特別是有助釐清國家、地方，彼此之間在同一件事情下有怎樣的傳承和互動的問題。

二、運而不動的五四新文化

縱然香港擁有不少碼頭搬運工人、機器操作工人與運輸工人，但他們在爭取勞工權益發起工潮時，最終的籌碼也不過是集體離港返鄉，藉以癱瘓相關行業的運作。因為戰亂或天災等問題而移居香港的下層民眾，他們大概只是抱著暫避短居的心態在香港居住，沒有落地生根的決定，一待國內政局平穩便又舉家回流北上。這種情況在1950年代以前甚為普遍。這些都讓在港華人適應社會經濟環境時，不太容易生發自覺求變的要求。然而，這是否就說明了五四在香港不可能引起迴響，不可能衝擊香港政府的管治權威？

從報刊或前人的回憶錄所見，香港還是受到五四運動反日風潮的衝擊，內地罷買、罷賣日貨的行動在香港還是引起了迴響。基於香港與周邊華南區域的人口流動性與經濟商貿的緊密來往，內地發生的任何事情，透過人員的流動與報刊、電報的傳播，很快地得以在港擴散。在港居住的人民，也許不滿意內地政局或執政者，但他們並沒有離家棄國的想法，反而表現了一種不認同當政者，但認同自身作為中國人的歸屬感與民族認同感。只是，生活在殖民地地上，需恪守當地嚴禁排外、杯葛日貨或反日的法律條例，並在港府的緊密監控下，香港的罷買、罷賣日貨是難以發展起來的，但也有數則事例說明香港民眾受五四風潮衝擊的情形：

第一，報載零星的市民罷買、罷賣日貨事件以及張貼反日貨宣傳單張。港大學生拍發聲援北京學生運動及懲治「賣國賊」的電文，並選派代表到廣州參加國恥紀念大會。

第二，九名八至十七歲的學生持有寫上「國貨」二字的油紙傘，他們甫上街遊行便被警察如臨大敵般拘捕，送上法庭，進行為期十天的審訊；最後以「上街遊行沒事先通知華民政務司」為由判為首的十七歲學生罰款十元。

在政治層面或學生為主體的五四愛國運動，對港產生了一些衝擊。畢竟，政治層面的五四是以一種超越政黨政治甚至是國家機制的愛國運動。在「內除國賊、外爭國權」的救國主題與口號下，是較容易燃點國人充滿義憤的民族主義情緒，引發國人在生活層面實踐救國行動。但是，它還是因為警方的控制而沒有在香港引起多大迴響。我們也許可以這樣說，在反日救國的規模上和行動組織上，政治的五四在香港只是零星地、鬆散地進行，最後因受到港府嚴加管制而只能曇花一現。然而，相較於政治層面的五四，新文化、新文學等這些屬於知識層面的內容，則很難衝擊在港華人以至於遲遲未能在香港引起社會迴響。¹⁶

時人孫受匡（1900-?），於1920年代初畢業於香港皇仁中學，他創辦的「受匡出版部」是香港第一家出版新文化書籍的出版機構。¹⁷他在1923年出版的《熱血痕》一書大力呼籲香港時下青年要有與北京學生看齊的愛國心，他筆下反映了香港的學生當時對於國事是十分冷漠的：

香港學生學「死」，香港多數的學生學「死」，香港多數讀中文讀英文的學生學「死」。此近日社會上言論家對我香港學生所下之批評也。余聞斯言，余愧斯言，余有感于斯言，余更大惑不解于斯言。……香港學生何嘗學「死」哉？溯自國內「五四」、「六三」運動以來，各省學生莫不桴鼓應，惟香港寂

¹⁶ 相關觀點的部分闡述，最早見於拙著：《五四在香港：殖民情境、民族主義及本土意識》，頁87-215。

¹⁷ 香港中文大學大學圖書館編：《香港文學通訊》第50期，2007年9月24日。網址：<http://hklit.lib.cuhk.edu.hk/news/iss50.jsp>，2019年1月29日。

然不動。各界人士遂以為香港學生無愛國心。¹⁸

他把香港學生悉數歸類為以下七類人：「創書派」、「片面覺悟派」、「渾帳派」、「嘆息派」、「罵新亦罵舊派」、「不理事派」、「奴隸派」。他這樣釐定香港學生之準則，就在於他們對國家不聞不問的態度；他其中特別批判的就是時下同輩對於五四運動、山東問題也是冷漠的。譬如他筆下的「創書派」就是不理會周遭發生事情的一群人：

世界上近日之潮流、外來之事物、社會之黑暗國家所處之危機之地位，一概不理。「五四」、「六三」之運動，山東之問題、廿一條件之秘約，某人在東三省之經營之橫暴，視作等閒。彼輩所最注意者，考試分數之高底，以為彼輩讀書之勤奮、學生之良否的商標而已。¹⁹

他又界定「渾帳派」說：

此派學生不知何者為世界、不知何者為國家、不知何者為廿世紀之潮流之趨向，亦不知何者為學生應有之責，任人之凌我弱我。彼等不知有恥，木屐兒欲強取我青島，彼等不知有憤。廿一條件秘約，無形亡我國者也，彼等不知有懼。我中國各處之重要，口岸為人割據，盡彼等不知有憂。彼等所知者，飢也則食飽也、則游倦也、則眠覺也、則起衣服之；花紋何者為新瑣，鞋履之樣子何者為新式，游樂之地方何者為最適宜而已！彼等心目中，一若舍此以外，無有應辦之事、應盡之義務。故祖國無所用其愛，亦無所憂其忘。蓋愛祖國于彼無大益，而忘祖國于彼無所損也！彼等之生，如行尸走肉，能運動而不能知覺，徒懦然虛度此數十秋而已。²⁰

¹⁸ 孫受匡：《熱血痕》（香港：虞初小說社，1923年），頁59-70。

¹⁹ 孫受匡：《熱血痕》，頁60-61。

²⁰ 孫受匡：《熱血痕》，頁63-64。

除了這七派人外，餘下的當然還是那些不知有「愛國救國之事業」，也不會「盡學生一分子之義務」的學「死」一類的學生。²¹ 就如時人刊於《華僑日報》的文章所說的，「香港的學生，向來是陳腐不堪。對於國家現狀及世界潮流，多是不懂的。我敢說，若然你向好些學生問起胡適、魯迅、郭沫若係那種人，恐怕他們是啞口無言。」這名自稱為「吹風」的作者，文末不忘呼籲時下的「同學們」要走向「光明」——就是「讀多幾本新文化的書籍」，使頭腦不陳舊，不要成為「新時代的落伍者」。這篇文章可以說是引證了孫受匡一文的論述，一方面陳明香港學生的喜舊、保守；另一方面亦說明他們對於中國大陸發生的事情基本上是不聞不問的。國內新文學、新文化之風潮還沒有對香港構成衝擊，香港的新文化書籍仍是寥寥可數。²²

1927年，時人眼中的香港文壇，新文學仍然是未能夠盛行——「新文學固未盡行，舊文學亦未盡廢」、²³「香港的語論界。還少新的傾向……國語之提倡。實不容緩了」。²⁴ 在孫受匡文章出版後的五年，另一名香港學生接續孫氏之言，繼續寫了〈香港學生該學「生」了〉（1928）一文，力批香港學生對於國家命運遭遇、社會問題的麻木、冷漠態度：

內地的學生們，常常說道：「香港的同學，不是學『生』，而是學死」。……自殺有犯不著學的？由此推測，我們可以堅定地斷定他們是麻木地走錯了一條引入地獄的路了。……「呵！香港學生！——我也在內——這都是你們的弊病：應當革新了。

²¹ 關於1920年代中後期類似孫受匡這類年輕一代竭力呼喚新文學、新文化的論述，另見陳學然：〈百年運動 莫忘初衷：學生與學死〉，收於周佳榮、黎志剛、區志堅編：《五四百年：啟蒙、記憶與開新》上冊（香港：中華書局，2019年5月），頁113-134。

²² 吹風：〈香港的書店和學生〉，《華僑日報》第1張第1頁，1926年12月15日。

²³ 羅禮銘：〈新舊文學之研究和批評〉，收於陳國球主編：《香港文學大系·評論一》（香港：商務印書館，2016年），頁110。

²⁴ 探秘：〈聽魯迅君演講後之感想〉，收於陳國球主編：《香港文學大系·評論一》，頁124。

亡羊補牢，並不算晚。現在我們最先要知道的，就是國家的情形怎麼樣，和我們所處的是什麼地位。」²⁵

關於新文化運動在香港難以引起迴響的言說，上文提及的1927年魯迅訪港的例子，也可讓我們看到一些端倪。從魯迅當時所發表的演講可以了解到，新文化層面的五四在當時的香港實際上是運而不動的。魯迅在1927年2月16日於香港青年會發表名為〈無聲的中國〉的公開演講，他對出席講座的香港年青人呼籲，要他們捨棄古文以求在現代社會中生存，也鼓勵年青人要推開古人，大膽地說出真心話、勇敢地前進。然而，要年輕人在他筆下保守的香港社會裡推開古人、大膽說話，難免是太過強人所難。在1927年2月19日發表的〈老調子已經唱完〉的演講裡，魯迅把前清遺老、讀經、尊孔、祭孔、八股、考試、做古文、看古書、舊文章、舊思想等等一再大力貶斥，將之看作是一堆和現代社會沒有絲毫關係的古老舊物。²⁶魯迅對傳統嚴詞抨擊，是因為這些東西、事物表現了一種對科舉、皇權體制的崇拜，是反現代、排新拒變的傳統舊物與封建遺毒。

香港本身的狹小社會空間在魯迅的眼中無疑保守異常的，文壇、學壇主要由前文所說的晚清翰林把持，社會經濟也由殖民地官員及其認可的華人代表所主導。華人代表主要是由前清官員或買辦所構成的紳商團體。他們在香港結社雅集、詩畫會友，平素書寫文言文和主張讀經、尊孔，²⁷以「海濱即是鄒魯」的心態在香港存續文化道統。年輕的一輩則如時人所說的，自然是「受了環境的影響，對於舊文學不能不取信仰的態度」，而變得「暮氣太深」、「處於混沌的狀態」、「奄奄

²⁵ 周拱照：〈香港學生該學「生」了〉，《微明》1928年第1期，頁14-16。

²⁶ 魯迅：〈老調子已經唱完〉，《魯迅全集》，第7卷，頁321-327。

²⁷ 關於前清遺老們在1910-1930年之間廣辦詩社，詩詞雅集頻繁和相互唱和，他們的詩文選集可見程中山編輯的《舊體文學卷》，藉此可以了解舊體文學在香港興盛之瀕及他們在當時表現的追懷故國、尊孔。請參程中山編：《舊體文學卷》，收於陳國球主編：《香港文學大系》，第9卷，2014年。

無生氣」。²⁸ 魯迅的訪港，對於1927年仍給舊文學、舊思想占據的香港而言，其演講的重要意義被喻為是「暮鼓晨鐘」。但是，時人也不諱言，這種暮鼓晨鐘的效應對於就要「陳死」的青年們和文學革命「今後之進程如何」的問題，是「不敢斷定」的了。²⁹

魯迅訪港期間見證了各階層僑民熱烈地舉辦孔誕盛典。在魯迅筆下，洋總督與前清遺老為尊孔讀經之事樂而不疲，促使他在離港後仍憤憤不平地寫了一篇〈述香港恭祝聖誕〉，表達對香港上層社會的鄙夷之情，明言譏笑金文泰對華人是怎樣的「教導有方」。³⁰ 在魯迅等新文化運動領袖的認知裡，國內的尊孔、忠君等舊思想與新時代時格格不入的。早在民元初建，出任教育總長的蔡元培（1868-1940）便主張取消祭孔、讀經，他在〈對於新教育之意見〉一文中便提出「忠君」與「共和政體」彼此不合，而「尊孔」與「自由思想」相違的意見。³¹ 但歷經袁世凱（1859-1916）復辟，祭孔、讀經又大行其道，這舉動進一步引起國內趨新群體的反感。魯迅訪港，適逢香港正在舉辦祭孔活動。他因此便在面向香港青年演講時，對香港中上層社會的舉動作出激烈批判。

由於魯迅對香港社會的保守氛圍批判甚力，連帶他參與創辦、遠在北京的《語絲》周刊，也開始關注起香港社會文化落後的問題，連續刊載數篇譏評香港的文章。其中一篇這樣說：

從前的學校（指大學以下說）注重英文，聖經，而現在卻偏重古文，經典。要是古文……之類考試不合格，即使英文強也不能升班。說也奇怪，有幾個英國人當查學司的，居然也能背得出〈前出師表〉、〈後出師表〉，和幾十首唐詩。每逢到小學去

²⁸ 碧痕：〈文學革命〉，《華僑日報》第1張第1頁，1927年2月25日。

²⁹ 碧痕：〈文學革命〉，《華僑日報》第1張第1頁，1927年2月25日。

³⁰ 魯迅：〈述香港恭祝聖誕〉，《魯迅全集》，第4卷，頁52。

³¹ 蔡元培：〈對於新教育之意見〉，《蔡元培全集·第2卷（1910-1916）》（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頁136。

查學，必定挑選一兩個小學生背誦幾句。背得過時，他便伸手撫摸小學生的頭說：「你真乖」，後來那些國文教員知道了外人熟識那幾篇古文，那幾首唐詩，便把這幾篇書教會了小學生，叫他們天天背誦，好待下次來查。香港既然看重了古文，經書之類，於是，那些彎腰拱背的翰林、舉人、秀才之流，爭先恐後的到香港設塾，並且舉出二三個名頭大的，來作發起人，組織了一個孔教會。³²

1928年，遠在北京的《語絲》批判香港的孔教活動，而在南京的國民政府則更於同年2月頒布「廢止祀孔」明令；然而，1928年前後的香港孔教會卻繼續大辦義學，不但沒有停止各種大型的祀孔活動，更加在這年的四月份密鑼緊鼓地興築「孔聖會堂」，誓讓「魯魏廟峨」不久便將告在港成立，使每年舉辦的恭祝孔誕活動得以更具規模地上演。³³ 由此可見，省港大罷工後，香港的新文化不但不能隨著工潮的擴散而進入香港，反而激發以香港上層華人紳商組成的孔聖會從上而下發動各種以尊孔名義為中心的文化復古運動。如李保葵、李亦梅、盧仲舉等紳商在主持1926年的孔誕祝聖典禮中便十分針對性地表明工潮後香港社會「世變道不變」的決心，而香港社會尊孔之心在工潮衝擊下——「則無時或息，絕不因環境之異、空氣之殊而略改其態度」。³⁴ 在如此的文化氣氛下，不難看到終1920年代——亦即五四運動在中國國內大行其道的十年裡，香港一隅要感受五四新風的吹拂或洗禮，也不是那麼容易的。

1933年11月，我們可以看到仍有數名作家為文批判香港文壇的守舊勢力與保守的文化氛圍。在他們眼中，香港社會或文壇仍然

³² 澤川：〈遊港雜記〉，《語絲》第4卷第42期，1928年10月，頁30-36。

³³ 〈孔聖會本年義學近況〉，《華僑日報》第4張第2頁，1927年2月28日；〈報效孔聖會堂地之熱心〉，《華僑日報》第2張第3頁，1928年4月27日；〈孔聖堂總務部會議情形〉，《華僑日報》第2張第1頁，1930年1月16日。

³⁴ 〈孔聖會祝孔特紀：香港孔聖會祝聖情形〉，《華僑日報》第2張第3頁，1926年10月5日。

沉淪於「封建式的鴛鴦蝴蝶派」一類的風花雪月，對此而表露出一種深惡痛絕的情態。署名水人的作者在〈關於「香港文壇今後的動向」〉一文直言：要在香港找出「較有重要性的時代作品，這真是等於晨星」。他也如此斷定香港文壇的不景氣原因：「最大原因自然是香港一般執筆的文人們尚陷在『黑色古井』中游涸；不，也許是鑽在象牙寶殿裡醉生『夢死』地歌頌。」³⁵ 另一名署名石不爛（原名石辟瀾，1910-1947）的作家，他於1933年11月則以「沉寂冷靜的香港文壇」來形容香港當時的文學發展景象，並對當時香港的社會文化發展的病痛，作出以下診斷和分析：

在中國久已失了氣的孔老二，只有在香港才有他的權威——是否孔老二本來的權威，請勿論它——我們只要看八月廿七孔誕日的舉港如狂，張燈結綵，便相信香港之於孔誕，是無異復活節、聖誕節的隆重了。至於教育，除了必須認識的文字——英文外，便是與現代生活毫無關係的古國的倫理觀念，至於前清的翰林進士，也惟有來到香港，才有他的出路。人們為什麼需要這一批老先生呢？這一批老先生對廿世紀的西方文明有何裨益呢？這四書五經對現世紀的社會生活有何關係呢？而人們必如此厚遇他，用意何在，不問可知了。因此，香港雖然是一個極其發展的都市，〔但〕實際上還脫不了一套長衫馬褂。³⁶

石不爛這位早期在港活動的共產黨人，沒有很針對性或具體地指出「人們」如此「厚遇」前清遺老的「用意」，但對於在香港這個極其發展的都市仍然脫不了「一套長衫的馬褂」，這就不是一般的「人們」所可以左右的。這必定與在港的中上層社會或知識菁英團體的維

³⁵ 水人：〈關於「香港文壇今後的動向」〉，收於陳國球主編：《香港文學大系·評論一》，頁194。

³⁶ 石不爛講，楊春柳記：〈從談風月說到香港文壇今後的動向〉，收於陳國球主編：《香港文學大系·評論一》，頁190-191。

繫、推動息息相關。甚至可以說，前清遺老因逃難而南下香港，從北京的中心到了國家境外而淪為邊緣人物，繼而由邊緣的位置進入香港社會的中心，透過身分的重新確立以及他們祭孔復古的行動，由始至終都是得到了殖民地管治者的認可和配合，如此方有他們的「出路」與構成所謂香港「人們」對他們的「厚遇」。就此，亦有當時居港人士作出一針見血的評論：

英人之經營殖民地者，多為保守黨人，凡事拘守舊章，執行成法，立異趨奇之主張，或革命維新之學說，皆所厭惡，我國人之知識淺陋，與思想腐迂者，正合其臭味，故前清之遺老遺少，有翰林，舉人，秀才等功名者，在國內已成落伍，到香港走其紅運，大顯神通，各學校之生徒，多慕此輩，如吾國學校之慕博士碩士焉，彼輩之為教也，言必稱堯舜，書必讀經史，文必尚八股，蓋中英兩舊勢力相結合，牢不可破，一則易於統治，一則易於樂業也。學校之數量頗多，有政府設立者，實行其「大英帝國為中心」之教育，中文為課程之一，然僅「子曰，之，乎，也，者」之訓，絕無學術思想之可言。³⁷

在殖民管治者與華人領袖的合作下，被視作異端邪說的新文化、新文學，其「進步」是很緩慢的。正因如此，才会有石不爛無奈地把香港文壇稱為「沉寂冷靜的香港文壇」的原因；當然，也會有胡適1935年訪港時對香港文壇的新文學風潮運而不動的批評。³⁸ 胡適當年是應香港大學之邀來港作演講，他對所見所聞老實不客氣地痛斥

³⁷ 友生：〈香港小記〉，收於小思編：《香港的憂鬱——文人筆下的香港（1925-1941）》（香港：華風書局，1983年），頁23-27。（原載《前途》第2期第5號，1934年5月1日，頁51。）

³⁸ 關於香港一隅社會保守氣氛的構成——港府執政者如何與前清遺老、華人紳商組成保守而排拒新文學新文化思潮的政學商三合作局面，從而讓香港的新文學或新思潮發展運而不動、難以蔚然成風的原因，請參考陳學然、韓子奇：〈金文泰治港時期的政學商互動及其對五四新潮的排拒〉。

一番，直言在港深受尊崇的前清翰林在江浙一帶多的是，這些人「不值得驚羨」，而他們也只不過是一些「不適用的東西」，並指他們主張的文學也沒有價值云云。³⁹ 由此，不無反映新文化層面的五四在香港一隅遲遲難以擴散的事實。那些邀請魯迅、胡適來港演講的有心人，要打開這運而難動的新文化局面，看來一直都是舉步維艱的。

新文化發展局面被打開，要直至遺老的相繼隱退和離世後才告開始。當然，這與國民政府當政執政的文教方向更有密切關係。統一中國的國民政府推動的是新文化、新文學，並曾一度下令停止祭孔，而習用的官方語言又是白話文而非文言文，再加上內地文化環境的轉變，這些都促使香港政府及香港大學主事人急於要跟得上內地社會的發展步伐，遂有尋求周壽臣（1861-1959）、羅旭和（1880-1949）等華人領袖的支持，並由此推行針對港大的讀經課程或文言文教習傳統的改革措施。這也讓許地山（1893-1941）得以在胡適舉薦下出掌香港大學中文學院，他以入室操戈之姿在香港大學打開了新文化新文學發展的一個小缺口。當然，新文化在香港的傳播和有所發展，並不是靠許地山一人之手，乃與大力推動經學教育的港督金文泰離職、華商總會開明派上臺、日軍侵華引發的大陸政治環境急劇轉變等等有莫大關係。⁴⁰

三、左右分裂的「五四」

五四於香港的在地化發展，由五四運動爆發後波及香港而遭受壓

³⁹ 鄭德能：〈胡適之先生南來與香港文學〉，收於鄭樹森、黃繼持、盧瑋鑾編：《早期香港新文學資料選（1927-1941）》（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1998年），頁22。

⁴⁰ 甚至我們可以這樣說，港大當局或許地山能夠改革港大中文學院的課程，首要的條件還在於周壽臣及捐資籌辦中文學院的華人領袖、華商總會不加以反對的情況下才得以實行。有關論述另見陳學然、吳家豪：〈香港華商總會對「五四」在地化的迎拒〉，《杭州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五四」百年特輯，預計2019年第3期刊登。

抑後，不論是從政治層面的五四，還是一直運而不動的文化層面的五四，都要在1930年代中期內地政局大變、在地知識結構隨著南來知識社群湧港後發生變化之後才有真正的發展。1930年代中後期，大批知識分子或負有黨政工作的文藝陣營人士大舉湧港，或避戰火或開展抗日宣傳工作，一時間占據了香港的學壇、文壇和思想界。由此也可以看到是，今天所理解的以土生土長港人為主體的文化活動空間或文藝團體，在當時來說說是難以見及的。不過，1930年代的南來知識群體，他們自身或受其影響的年輕一代，在香港紀念五四，目的是要在時代大潮下呼喚國魂以鼓起人心抗日救國。

但是，在抗戰勝利後的一段長時間裡，五四在香港成爲了不同政治陣營相互攻訐時所爭奪的思想資源與歷史遺產，借之以爭取海外華人的向心力。香港也好，五四也好，成爲了一座平臺和不同目的的建國手段；它們的本身到底是什麼，其實無關重要。香港與五四運動一樣，均有其複雜的歷史因素，在思想和精神上均體現了它們的多歧性與多面性，在不同的人的手上被作出不同的詮釋和不同的利用。自1940年代中期以還的國共內戰到國共易幟後重建新中國，香港與五四均成爲了國共兩黨面向海外華人或國際社會的重要政治輿論宣傳戰場與手段。五四運動更因爲是全球華人的共同歷史記憶，成爲了兩黨建國救國時的思想工具和一再張揚的思想旗幟，它的歷史資源與思想價值被不斷高舉。這樣的結果，就是讓五四運動的精神越發淆亂紛雜。

五四運動「外爭國權，內除國賊」的口號一開始所要反映的是，這是一場超越黨派政治、國家政權的愛國運動，參與者從維護孔孟故鄉、保衛民族聖域到曠日持久的罷工、罷市、罷學的抗爭運動裡，充分反映出人們對於國家主權、民族尊嚴的思想覺醒與自主意識。這些思想資源一方面讓五四在被紀念時，既有其直面民族國家而超越政權、政黨的拯救民族家國的口號，被充分利用來展現愛國主義、民族主義的國家話語。另一方面，五四也是很容易被不同政黨或不同聲稱

繼承五四精神的政客所收編、所利用，並淪為政治鬥爭的工具。

從香港本土成長的作家、香港大學學者陳君葆（1898-1982）的身上，又或者是在1930年代在香港成長的本地中學生的體驗裡，他們也在全民抗日時期發表了不少紀念五四、繼承五四的文字，透過五四展現他們一套套指向中國的五四愛國言論。不同背景者，其愛國目標即或一致，但所奉行的方法或原則往往又因為政見的不同而各有南轅北轍之異。

左右分裂、國共對峙，在香港向來是壁壘分明、顯而易見的。即使是1940年團結抗日救國統一戰線口號下，國民黨紀念「五四」但也不忘防共批共。到了1948年國共內戰而前者節節敗退的時候，此際的國家的五四紀念只剩下高喊「奸匪」、「共匪」、「國際奸匪」等叫罵聲。往後，國民黨亦借五四紀念宣揚三民主義精神、強調維護國家統一的愛國意識以及借之批判共產黨「愚弄青年，麻醉青年，陷害青年」。⁴¹ 共產黨則借著五四紀念以凸顯其民主革命的理念，高呼繼承五四精神以掀起「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的群眾革命運動」，向「獨裁賣國集團總」發起總反攻。⁴²

至1940年代後期，隨著國共勢力的此消彼長，在港國民黨的言論陣地被共產黨逐步收編而舞臺、空間漸為狹小，在詮釋五四的力量或感染力上因此潰散。作為國共內戰期間香港最重要的社會輿情推動器的報刊，在兩黨權勢轉移後也迅速出現政治立場變化的結果。《星島日報》這份當時重要的香港右派報刊，在1949年基於創辦人胡文虎（1882-1954）顧及在大陸的家族生意，刊採立場因應政治形勢的轉變而向左轉。在1949年是五四三十周年，該報也開闢了「五四」三十周年紀念特輯，在主要內容上與《大公報》類同，旨在強調青年知識分子應如何自我改造、知識分子應與群眾如何緊相結合。譬如該報刊載署名麥田的作者，他在〈迎接「五四」應該做些什麼？〉一文

⁴¹ 〈我們誓與青年們站在一起〉，《國民日報》第4張，1946年5月15日。

⁴² 原野：〈中國學生運動的任務〉，《達德青年》1947年第2期，頁10-11。

裡便很清楚地向在港在海外的讀者指出——知識分子脫離人民群眾，就是「自取滅亡」。⁴³

不難看見，1949年中共建政以來，香港的報刊媒體因為政治形勢轉變，在「五四」紀念領域上出現了左右兩極此消彼長之勢，親共背景報刊如《大公報》、《文匯報》、《星島日報》等等都氣勢如虹地大篇幅宣揚五四新民主革命事業。⁴⁴然而，在親國民政府媒體於香港偃旗息鼓之際，知識界或學術界卻出現了大量的反共論述。這些反共論述主要源於冷戰時期雲集香港的南來知識社群，當中不少人擠身於1949年後如雨後春筍般建立起來的私立專上院校。較著名的有錢穆（1895-1990）、唐君毅（1909-1978）創辦的新亞書院（1949），國民黨一級上將陳濟棠（1890-1954）創辦的珠海書院（1949）。餘者還有親國民黨的香江書院（1949）、廣大書院（1949）、崇基書院（1951）、光夏書院（1949）、華僑書院（1949）、文化書院（1949）、廣僑書院（1952）、廣大書院（1950）（後四校與平正會計專科學校〔1937〕於1956年合併成聯合書院）、香港浸會書院（1956）等等。

大批在上述院校任教的南來知識分子，他們在思想上的共同趨向就是不接受外來的馬克思思想、共產主義。他們認為中共接引異族異國思想文化以摧殘中國傳統文化、儒家經籍，把1949年的江山易幟看作是中國亡國亡天下的徵候。他們基於濃烈民族主義背井離鄉，以逃亡者或流亡者的身分自居留港辦學，期望能夠保守傳統文化與溝通中西思想，培育文化種子以為重建祖國作準備。在他們的思想底層，有其追求民主、自由、人權等普世價值的知識背景，同時也有其亟亟

⁴³ 相關論述另見拙著：《五四在香港：殖民情境、民族主義及本土意識》，頁251。

⁴⁴ 當然，《星島日報》於1953年開始又呈現了清晰的親國民黨和擁護蔣介石的立場傾向，這與胡文虎家族不願意向中國的新政府繳交巨額稅款而在「大陸的生意和投資遭到沒頂的打擊」，因而對共產黨產生怨懟憤恨之情。（參見鄭宏泰：《虎豹家族——起落興衰的探索和思考》〔香港：中華書局，2018年〕，頁124-129。）因此，我們也可以看到了在1954年的五四紀念文章，又是從國民黨的擁蔣反共角度闡釋五四精神。

於維護中國傳統文化的使命以及致力溝通中西文化異同的學術關懷，故在思想型態上與共產主義、馬克思思想分歧不淺。值得注意的，莫過於在一眾私專院校最享負盛名的新亞書院知識社群，他們在港興辦《民主評論》、《自由陣線》、《人生》、《祖國周刊》等刊物，闡述他們的學術關懷與思想追求。

值得一提的是，南來者對於時代問題、當世學術思想發展的思考都與五四運動關係密切，或以五四為傳統的總結與現代學術的開端，或以五四為反傳統而造成中國思想真空以興起共產主義「亡國亡天下」之開端，又或以五四啟蒙思想與民主、科學精神為當前建國復國的思想資源。1949年的余英時，他在離國來港時便在思想層面發生「精神變異」。這是源於他在潛意識中對於植根於他思想深層的「五四新文化的許多價值，特別是『科學』和『民主』」發生的作用。⁴⁵換言之，他們乃是帶著五四的思想因素——不論是反對的或贊成的，於邊緣的在地者去思考當前國家時局困境出路。職是之故，他們的文章不少都反映了這樣的一個共通點：一切改革從五四談起，一切問題根源的解決也必須回到五四的起點。這些不但從余英時的身上看到，從他的師輩錢穆、唐君毅的身上也能清晰看到。⁴⁶

在50、60年代影響數代青年學生的《中國學生周報》，創刊於1952年7月，余英時任創刊主編。這份深獲南來知識分子支持的學生雜誌，刊載了大量的五四運動紀念文章與評論文章，深刻反映青年群體的家國情懷；所發表的談及五四精神價值的文章，呈現出一種寄身國門外的異域青年，以相對多元的角度與思想面向來批判五四、讚揚五四，表現一種既欲繼承但同時亦立意有所超越的青年人心態。新亞

⁴⁵ 余英時：〈赴香港「吸取自由空氣」——〈香港與新亞書院〉之一〉，《明報月刊》2018年1月號，頁18。

⁴⁶ 相關文章可見拙文〈唐君毅對「五四」的詮釋〉，《鵝湖》第359期（臺北：鵝湖雜誌社，2005年），頁44-57；〈道統庚續與五四批判：錢穆學思管窺〉，《錢穆研究暨當代人文思想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錢穆故居管理處，2010年），頁181-210。

學生唐端正的紀念文章透過紀念五四，指出求學、做事、辦刊物或寫文章都是在實踐當前的新任務：

今天我們的新任務是什麼呢？讓我們喊出來吧！讓千千萬萬的青年同胞齊喊出來吧！這個新任務就是：「保衛祖國的歷史文化」……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偏差，曾經使祖國的歷史文化飽受摧殘，但我們不能過責他們，因為他們所負的只是推陳開新的先鋒使命，歷史的責任不能全推在一個時代裡。今天我們應該警覺了，保衛祖國歷史文化的新使命已落在我們的身上。五四時代不能負起保衛祖國歷史文化的使命是可以寬恕的，如果我們今天不能負起這個使命，我們便永遠是歷史的罪人，我們是萬萬不能推託的，我們更不應該推託的啊！⁴⁷

除了復興傳統文化外，新生代紀念五四時也致力於闡揚其「民主」、「科學」、打倒權威的時代意義。他們倡言說：「把目光轉向前面，爲了中國的再生，我們這一代的中國青年要拿出魄力，使『五四』復活。再掀起一個新文化運動，慢慢從頭作起。」⁴⁸「文化中國」與自由世界的連接，反過來進一步是要圍堵「政治中國」，這些體現了冷戰東西方陣營的兩極對峙氛圍。作爲《中國學生周報》編輯群的師長人物，錢穆、唐君毅等人也發表了大量談論五四運動的文章。他們這些既是見證五四爆發的中壯年一代，不但批判新文化層面的五四，甚至也把五四與左翼、共產黨在五四時期的興起乃至國民黨的退守臺灣扣連起來，表達了一種反五四以反共的時代意識。他們批判五四的另一個主因，與他們守護中國文化正統的文化民族主義、承繼儒家道統的文化保守主義等息息相關。⁴⁹五四新文化運動一眾領導

⁴⁷ 唐端正：〈我們的新任務〉，《中國學生周報》第41期第3張，1953年5月。

⁴⁸ 〈要把「五四」復活〉，《中國學生周報》第41期第1張，1953年5月。

⁴⁹ 有關錢穆對五四運動的觀感或態度，見拙文：〈道統庚續與五四批判：錢穆學思管窺〉，頁181-210。

人如胡適、魯迅、陳獨秀等等在他們筆下都深受批判。

不可否認的是，香港的知識社群，特別是1940年代後期到港的南來者，他們對於作為中國人的身分意識或民族情感是毫不動搖的。正是這種情感，使得他們時刻關注國內發生的大小事情以及親朋、鄉人的動態，任何風吹草動也必然牽引著他們的民族情感。也因為這一情感，致使唐君毅一聽到四人幫倒臺的消息，便命門弟子將其出版的數冊著作寄回他曾經求學的北京大學與南京大學，更加諄諄告誡學生一輩在中國大陸政治稍靖時便要回國教書，發展傳統文化。從他的這種情感表現裡，我們可以看見政黨政治在這些生活於國家政治邊緣地方的知識群體的思想世界裡，不過是一時的，但國家、民族卻是永久存在的——更是不可以批評和破壞的，這點正是他們批判五四新文運動的根本所在。

於南來者眼中，五四既是造成現代中國政治巨變、山河變色的罪魁禍首，但它同時也是救治當下或未來中國的精神燈塔。於在地的左右兩派而言，五四也是他們相互爭奪的歷史遺產與思想資源，或用以振起海外同胞的復國建國之心，或用以鼓動起海外華人對於新民主主義的政治革命熱情，藉以掃清反動勢力和打倒帝國主義。這些看法，在1949年以來普遍存在於南來者知識文化圈裡。

南來者紀念五四的聲音或者是論述五四的精神資源，我們仍然將之看作是與他們所生活的香港有所關連。香港這塊「祖國」域外之地，為南來者提供了思想自由的空間及延續理想的可能性，讓他們在香港紀念五四、闡揚五四歷史資源的時候，得以近距離地旁觀中國大陸的發展，並且由此思考自身與香港、香港與國家的何去何從問題。

此外，家國一體的傳統思想觀念，不因南來者自身背負何種思想負擔而滯居香港，國家政權的更替始終無阻他們對於國家或民族身分的認同，這也是中國人從家天下的國到黨天下的國之上，還有一個更為神聖不可動搖的民族天下觀。在這種思想觀念下，於南來者手上，能夠表現民族情懷的、愛國的政治層面的五四，無不受到肯定；而那

個在質疑傳統文化的新文化層面的五四，則又一再受到批判，並且是往往將之與後來反封建反傳統文化、破四舊的文化革命思潮綑綁起來一併批判，視五四思潮直接促成中國出現共產革命以及破壞民族文化傳統的惡果。這種多面向的五四詮釋在冷戰時期左右對立的香港屢見不鮮，其分歧和複雜的面向所要反映的，同時也正是香港知識社群的不同政治光譜。

我們不難看到，落戶香港的南來者知識社群，他們雖然遠離國內政治文化中心，但他們每逢透過五四紀念的場域，對五四思想精神的詮釋除了總結歷史的得失外，更多的是在思考國家民族未來發展的大方向、大問題。他們討論的「五四」，無不帶著巨大的國家身影和折射出愛國主義、民族主義乃至文化保守主義的思想。因此，他們雖然是站在香港的這塊土地上發聲，卻很少關注香港在地的社會文化發展問題。五四運動在香港的在地化——特別是動用五四追求人權、民主價值來針對自己周遭生活世界的社會問題以發出改革聲音的，要直至1960年代末、1970年代初戰後第一、二代進出大學校園後才較為明顯。

四、五四的「在地化」發展

五四在香港——特別是在一群寧願漂流海外的學者以及新生代手上，反映的是一群地方知識菁英借之以思考可望不可即的國家大問題，並未由此寄託其太多的在地社會關懷。在1970年以前，談論五四或追求人生目標，大多是一些國家的、歷史的大敘述。在港的南來知識分子常以流亡者自喻，家亡國破的危機意識使他們對於中國文化傳統顯得尤為執著，也視流亡的行動為保護中國文化不滅的重要表現，採取了不與內地共產政權妥協的姿態。但另一方面，他們也以一種既珍惜香港在地的社會空間，使他們得以實踐文化教育理念，但同時也對於這塊由殖民地政府管治的中國人土地抱有難以言衷的無奈和

落寞，這使他們在多方感慨國家民族在現代的多舛命途之餘，較少投入心力去關注在地社會的不公問題或文化建設問題。

隨著時間向前推移，南來者在香港住下來而得其安身立命之所，而在戰後香港成長的一代也進入了高中和專上院校，他們筆下的五四及其所關懷的事物，除了國家的以外，也慢慢開始與本地、本土的社會文化連繫上來。由是，五四追求的民主、自由、科學以及現代性的精神，也開始由關注國家指向地方。於是，在同一本的《中國學生周報》裡，越來越出現不同主題的「五四」言說，議題上除「國家的五四」以外，也慢慢地出現「地方的五四」——亦即是在他們所生活的香港一隅，五四歷史遺產成爲他們批判乃至改變當下生活世界的精神資源。在具體內容上，固然有少人批判五四對傳統文化的破壞，希望由此而重振國人的文化意識以達致愛國建國的目標；但也有人透過紀念五四以強化民族意識，由是批判港人在殖民主義下苟且偷安：「在外國人的翼下受庇，苟延殘喘於自在舒適的生活中，樂不思蜀」，⁵⁰又挖苦這些人恨不得自己及子孫成爲「外國人」。五四運動成爲了激發時人民族意識的思想資源，藉以重振民族文化以對抗殖民主義、帝國主義，使香港人生活得有尊嚴。這位取名「懷國」的作者，於其文章末段情感激昂地闡揚這套觀念：

爲什麼我們不負擔起保衛中華文化的責任？爲什麼我們不起來發揚光大中華文化呢？前人已經爲我們作出了很好的例子，爲什麼我們不能像前人般，轟轟烈烈的奮發一番。喚醒香港的青年，喚醒中華民族。⁵¹

猶如作者那樣強調「作爲一個香港人，或者說是一個華籍的香港人」的身分，並且發願要改變香港重英文輕中文，又或者是立志要改變港人安於殖民情境生活之種種，告訴了我們1960年代的香港人的

⁵⁰ 懷國：〈重創五四精神〉，《中國學生周報》第668期第3張，1965年5月。

⁵¹ 懷國：〈重創五四精神〉，《中國學生周報》第668期第3張，1965年5月。

本土意識，的確是比過去轉進一層。這與南來者及其家人已紛紛放棄回國而在港定居不無關係，同時也與戰後第一代的逐漸成長乃至進入社會息息相關。

當南來的一代人既然開始以港為家，則自然會把握機會提出改變生活環境的訴求，1960年代中後期的多次社會運動的爆發與這種觀念的生成不無關係。1966年的天星碼頭加價引發了嚴重騷亂，而緊隨其後一年也有由工業糾紛引發，但由文化大革命思潮主導的「六七暴動」，這些均使香港人對於戰後以來在生活層面上愈來愈不滿殖民地政府因循守舊與不公平的社會管治有關，由此而要在日常生活上作出改變。1960年代中期湧現的還有「中文合法化運動」。這場由大學生發起而擴散至教育界乃至社會各階層所共同參與的社會運動，使港人反抗殖民主義、凸顯民族主義以及強調本土利益的思想廣泛延宕、散播開去。

進入1970年代，一些有理想的年輕人所處身的正是全球解殖、去殖以及保衛釣魚臺運動風起雲湧的時代，同時他們也對於1960年代中後期的「六七暴動」及其餘波印象猶新，新生代已不像父祖輩置身於國民黨、共產黨或左右的狹隘空間裡而處處追求國家理想。他們在相對安穩而繁榮的殖民地生活，也對於社會背後的各種不公不合理現象更加自主自發地提出質疑與求變訴求。1969年的五四運動五十周年紀念大會，便有大學生提出把紀念五四要與香港本土的社會問題結合起來，把關注的重點與感情由「國」轉移到「家」——他們所居住的香港：

港大的劉迺強同學，就香港青年對五四運動的看法發表談話。他指出，今日香港青年所面臨的境況，與五四當日的青年不同，當時的青年，生長在中國的土地上，愛國的情操是很自然的，猶如子女愛他的父母。今日香港的青年，他們的身分有如一箇棄嬰，「一箇棄嬰是否必須愛他的父母？」這是劉迺強同

學所提出的一個問題。劉同學並沒有給出答案。他接著指出，香港青年所面臨的，是如何在香港生存下去。香港青年生於斯，長於斯，他們的感情自然地灌注在這個地方。如果他們要做些什麼，他們將從香港本土做起。⁵²

當然，本土意識的萌發更早於1969年。自激進政治意識與「反英抗暴」為行動綱領的1967年「六七暴動」偃旗息鼓後，香港各界不得不檢討這場暴動爆發的原因，除了受國內文化大革命風潮所及外，也與港英殖民地政府百年來的不公社會政策以及華人受到諸多歧視因素息息相關。青年一代注視當下處身環境，亟求改變現狀。諸如橫跨1960年代末至1970年代的「中文合法化運動」、1970年代初的「保衛釣魚臺運動」、「反貪污、捉葛柏」的社會運動，均反映了新生代反抗帝國主義、殖民主義乃至關注香港在地事務的社會家國意識。這些在地的社會抗爭與家國文化認同的身分抗爭，構成了活躍於1970年代的新生代以「放認關爭」（「放眼世界，認識祖國，關心社會，爭取權益」）為其奮鬥目標，建立了承擔在地社會發展乃至建設家國的責任感。⁵³相反，這代人在家國認同的問題上已經不同於他們那批南來的師長。

南來的一代，生活在香港，不論是他們從事的興學施教，還是在五四紀念時節發表的言論，對象、目標都是面向中國大陸這個他們心目中的祖國與神州大地，標示救國建國乃至傳續傳統文化為其終極關懷，這點以港臺新儒家代表唐君毅最具代表性。他在港數十年，直言

⁵² 平（中國學生周報記者）：〈民主的實踐——「五四」五十周年紀念會側記〉，《中國學生周報》第877期第1張，1969年5月。

⁵³ 葛柏（Peter Fitzroy Godber）於1969年至1973年期間擔任香港皇家警隊的高級警官，官至總警司兼九龍區副指揮官。在位期間涉貪巨款而遭告發。事發後潛逃回英國。香港的青年學生發起「反貪污、捉葛柏」的大型集會及遊行，逼使港府成立肅貪倡廉的「廉政公署」，成功把葛柏從英國引渡回港受審。有關1970年代香港新生代社會運動情況的論述，另見拙著：《五四在香港：殖民情境、民族主義及本土意識》，頁254-292。

所關心的不是香港，所關注的只是中國的問題；對於管治香港的港英政府也只待以大家互為不存在的態度。⁵⁴但他的這番自述思想變遷之跡之言，迅速引來他任教的香港中文大學學生的群起攻擊，其中一名修讀哲學的學生領袖便直斥他為「孤鬼游魂、不存在的人生」，更將其以「互不存在」的態度對待殖民地政府視為一種對己對港對國均敷衍塞責的行爲。猶有進者，這名學生更以「不能反殖民主義，驅退侵略者」便不足以言中國文化、也不能「當一個堂堂正正的中國人」來批判師輩；在他心目中，唯有「對侵略中國神聖領土的殖民主義者作徹底的、毫不妥協的鬥爭」，方能「負起這個民族的使命」。⁵⁵

香港的另一所大學的學生會轄下刊物《學苑》，也在同一個時段發表反抗殖民主義的文章，並高舉起五四運動的精神旗幟，呼籲時下學生「去愛中國，繼承五四以來的學運精神」、「反對殖民地政府，掃除壓迫和剝削」。該文清晰揭櫫了他們的時代任務——「愛國和認識中國，反殖和社會改革」。⁵⁶上述的種種言論，不論香港中文大學學生那些批判師輩不能反抗殖民主義的言論，還是香港大學學生大聲呼叫的繼承五四以愛國、反殖民主義的口號，都反映了這個時代學生群體在香港社會轉型過程中，他們與上一代人的代溝以及對於香港殖民管治下不公的社會制度、施政措施的不滿與反抗。

當學生一輩在火紅的年代裡，自覺站在殖民地政府對立面的時候，作為一個中國人的身分意識以及青年人的浪漫激情的特質，反過來也推動他們對於國家民族多了更多探求的熱情與動力，這包括了對於打著反殖反帝旗號的共產政權也多了幾分了解的興趣與同情的理

⁵⁴ 唐君毅：〈中國現代社會政治文化思想之方向，及海外知識分子對當前時代之態度〉，《唐君毅全集第14卷·中華人文與當今世界（下）》（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92年），頁193。

⁵⁵ 鄭國明：〈論中國人在香港之歷史責任——所感於六月二日晨讀唐君毅先生之文者〉，《新亞學生報》1973年3月第1期，頁11。

⁵⁶ 肖其：〈從大方向到現狀與個人〉，收於香港專上學生聯會編：《香港學生運動回顧及檢討》（香港：廣角鏡，1983年），頁178-179。

解。他們走出校園、直面社會問題而發起連串針對殖民地管治的行動，並且別於一眾以流亡者自居的師長們願意北上大陸接觸中國，實現了愛港以愛國的目標。1973年10月，香港專上學生聯會舉辦了第一屆「中國周」，掀起專上學生回國觀光、尋根認祖的高潮。然而，隨著四人幫的倒臺，香港年輕一代之中對政治充滿憧憬和想像的一群，思想上受到衝擊，失去其焦點而出現混亂。一度興起的「放認關爭」、「認祖關社」（認識祖國、關心社會）等時代思潮與國粹派青年學生群體便逐漸式微。

至1970年代末期，面對1898年簽訂的「展拓香港界址專條」，香港只剩下二十餘年時間，海外乃至本地的工商業家在作出巨大而長遠的投資時，不得不思考「1997」這個「大限」問題。應該如何在政局騷動難安的大國身影下探尋香港的難卜前途，開始籠罩香港的上層社會，人們開始重新思索或重新界定自我的身分認同。

五、香港「回歸」前及後的五四

1979年，第二十五任港督麥理浩（Murray MacLehose，1917-2000）親赴北京面見中國國家領導人，表達關注香港前途的問題。中國當局按既定時間表來收回香港主權、治權的強硬態度，拉開了中英兩國長時段的主權交涉序幕。在港華人的香港人身分意識自此浸然興起，一旦不得不認真思考香港前途問題時，身分認同、國族認同便讓人感到模糊與徬徨，尖銳反映港人對大陸政府的信心危機。同時，與之此消彼長出現的一種情感，就是對英國殖民地政府的管治成績越來越感到滿意以至產生珍惜之情。1982年的三項主要社會民意調查顯示，「約有八成半至九成多的香港人及公司，都希望在九七年後香港能維持現狀，由英國統治」，清晰反映了港人「珍惜英國的管治」的事實。⁵⁷

⁵⁷ 鍾士元：《香港回歸歷程：鍾士元回憶錄》（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1年），頁37。

當時香港立法會便有部分非官守議員，因為不願英國全面撤出香港而回歸中國大陸，故當他們得知香港必定會在1997年如期被中國收回主權後，不禁傷心落淚。⁵⁸ 關於香港人的英國國籍法問題，在1982年開始也成爲了擾攘香港十多年的社會問題，直至1997年爲止，近三百五十萬港人領取「英國國民（海外）護照」，成爲沒有英國居留權的英國國民。

既在一種面對中國政府或共產黨政權龐大陰影下思考香港的出路，又是在適逢中國大陸實施改革開放政策的1980年代，越來越多的五四紀念著力於呼籲中國政府要實行民主改革，期盼中國能夠「變爲民主自由的現代化強國」。⁵⁹ 對於大陸政權缺乏安全感，一些人在紀念五四時著意發揮五四提倡的民主、科學精神，在欲彰顯五四的真民主的同時，也特別哀嘆、警惕五四的精神被大陸政權「濫用到可驚的地步」問題，連帶對被利用被操弄的五四也批判甚力：

它變成統治者機器麻醉人民的藥劑，它變成法西斯集團的打手，它變成獨裁者遮羞的畫皮。我們幾乎難以分辨它的真面貌，而那些形形色色，五花八門的歪曲也似乎立意要湮沒它的真面貌。⁶⁰

不過，同一時間也有不少人以積極、務實的態度面向香港回歸的既有事實，並爲香港的前途發展構想長遠的政體。1983年的香港中文大學學生會的交職典禮，便是以直面中國大陸的香港前途爲他們所奮鬥的方向。當時新任學生會長羅永生在宣誓言辭中便是這樣說的：「在香港社會和中國方面，則會積極關心香港前途的問題，在堅持中國人的立場，在這前提下，要求香港邁向民主道路。」⁶¹

⁵⁸ 鍾士元：《香港回歸歷程：鍾士元回憶錄》，頁56。

⁵⁹ 香港專上學生聯會：〈關於中國民主前途的「五四」宣言〉，《七十年代》，1981年6月，頁14。

⁶⁰ 殷惠敏：〈「五四」的迷惘〉，《七十年代》，1983年5月，頁60-61。

⁶¹ 〈堅毅實踐總結多方 創造一個更新時代〉，《華僑日報》第6張第2頁，1983

當1984年中英聯絡聲明簽訂後，香港人的意識便加快浮顯，再加上在回歸進程的起步階段中，對於一些在過去沒有國家觀念的土生土長香港人，他們便得思索何為「祖國」的問題。對於半個世紀以來居港的避難者或新移民而言，國內無日無之的政治鬥爭新聞或自身的苦難歲月，讓他們對於大陸猶存餘悸、對於回歸的問題心不甘情不願。香港主權將於有限的時日裡從英國人手上被中共收回，讓知識界尤為驚恐不安；再加上1989年爆發的那場被人與「五四」相提並論的「六四」天安門民主運動，讓港人對於中國政權以及回歸中國大陸更感恐慌。五四運動紀念場域中關於實現「民主」、「自由」、「人權」、「法制」的訴求與相關宣揚口號，在1989年的香港特別獲得強調和高舉。⁶²

1989年的五四運動紀念，因受北京學潮的影響，出現了香港史上的空前紀念盛況。從青年學生群體、大學學術機構到民間組織，都可以看見香港的前途與回歸問題是如何地與五四精神的核心——「民主」掛上關係的。港人固然藉著五四「這麼近」又「那麼遠」地關注國是、過問國家的未來走向，實質上是基於一種關於香港何去何從疑問的焦慮情感反映。然而，恐慌歸恐慌，回歸的車子一開動就不能剎停下來。知識界或者是說在戰後成長的第一代知識菁英提出了「民主回歸」的理念，在隨後的五四紀念裡，民主、人權、啟蒙和自由成為了重要的關鍵詞。⁶³

年3月4日。

⁶² 文：〈五四由沙田步行至尖沙咀渡海抵中環，學聯與十三大專院校大遊行支持內地學運〉，《華僑日報》第1張，1989年5月2日；〈五四大遊行〉，《華僑日報》第1張，1989年5月4日；〈五四運動七十周年〉，《華僑日報》第2張，1989年5月4日；〈學生遊行浩浩蕩蕩，市民夾道沿途圍觀〉，《華僑日報》第3張，1989年5月5日；〈紀念五四運動七十周年，五千多名大專學生遊行集會場會壯觀〉，《華僑日報》第5張，1989年5月5日；湘：〈15專上校講師宣揚五四精神，紀念五四街頭演講，市民支持中國學運，即場捐款表心意〉，《華僑日報》第5張，1989年5月5日。

⁶³ 黃枝蓮：〈是更上一層樓的時候了！紀念「五四運動」七十周年〉，《華僑日報》第5張，1989年5月6日；熙：〈梁永燊談五四運動愛國愛民，爭

進入1990年代，歷經1970年代社會運動的兩三代香港人在六四風暴後，縱然累積了不少公民意識，或者是關注政治前景以及社會民生的意識也有所提高，但當他們面對「中英談判」的當下港人一再被摒除於回歸談判桌上的現實時，港人對於中英政治爭拗充滿了無力感。中央政府堅拒港方或港人參與，只限於中英兩國的大國外交談判方式使港人感到不受尊重，為日後「被動回歸」情緒所引生的各種反抗行動留下伏筆。面對1997的回歸陰霾，港人忙於移民和消沉於「世紀末的奢華」下，在回歸前的數年裡反而在政治上的參與、發聲相對平靜、疏離和消極。1999年的五四八十周年紀念，回歸後的香港反而出現了五四紀念大為退潮的跡象。除了官方高舉愛國主義旗幟以紀念五四外，五四的其他的多元聲音則十分少見。

但是，平靜的河流下面卻隱藏著強大的伏流。回歸後環球經濟、金融的危機波及香港，再加上第一屆政府施政的失誤等問題，港人對香港政府乃至中央政府在國內「維穩」行動中的國家行為的不滿不斷增加。2003年五十萬市民上街遊行示威反對政府的「廿三條」立法引發出更大的社會管治危機以及民眾對抗政府的行動，一種去中國化的本土意識或本土主義逐漸在香港萌芽生根。其結果是，形成一些港人在批判強大國家身影的同時，反過來更加追念殖民地時期的生活模式和守護殖民地時期的各種歷史文化遺產。⁶⁴

香港自回歸以來，每年都會舉辦大型的五四周年紀念大會與大巡遊，藉著五四宣揚青年人「愛港愛國」的思想。但是，在官方或建制

取民主科學七十年未成功》，《華僑日報》第1張，1989年5月7日；金耀基：〈「五四」與中共的學潮〉，《香港時報》第6張，1989年5月8日；梁燕城：〈香港五四學潮紀實〉，《信報》第29張，1989年5月9日；李默：〈五四的省思〉，《華僑日報》第16張，1989年5月12日；〈教育界六次早餐會，回溯五四期勉中興〉，《華僑日報》第9張，1989年5月13日。

⁶⁴ 諸如反抗政府拆除中環天星碼頭、拆除皇后碼頭、守護殖民地時期印有英女皇皇冠的郵箱、郵桶等等。有關2000年以來港人的戀殖思潮和反政府反北京干預兩制的論述，請見拙文：〈香港的城市變貌與思想困局〉，《思想》第31期（臺北：聯經，2016年9月），頁63-91。

陣營以外紀念五四的，則又在高舉五四的批判聲音以表達出同樣的愛國愛港目的，表明其雖然不認同國家機器、國家行爲或者是政黨政治，但同時是另一種求變求新的「愛國情懷」。將在香港歷史上寫下一筆的「反國教事件」與「占中運動」，其發起的青年學生團體「學民思潮」在敘述其成立宗旨時，便聲稱是繼承五四精神而來，其言曰：

「學民」一詞來自我們本有學生的身分，亦同時帶有世界公民、中國國民和香港市民的身分，故此必須參與政策諮詢。「思潮」一詞則來自五四運動，當年學生撇棄中國舊有傳統思想，追求德先生（Democracy）和賽先生（Science），渴望民主、思想和言論自由。我們一班學生決意以當年的學生運動爲榜樣，追求自由開放的思想自由，而非洗腦式的盲目愛國情懷。⁶⁵

承上，我們是否也可以這樣理解，五四的愛國意識似乎很難限於對政黨政治或國家政權的絕對忠誠。五四的愛國意識本源於最早的反北洋政府和對抗帝國主義的侵略。所謂「外爭主權，內除國賊」，更加含有對於國家機制上上下下的嚴重不滿情緒與批判力量。因此，打著五四旗號而呼求制度改革的，與打著愛國的旗幟而大談五四的，從過去到今天都很難用非此即彼的二分法來爲其闡釋目的作出定性。進言之，五四本身就是一把雙刃劍。在過去百年來，不難看到但凡體制外紀念五四運動的，多少都有其明確針砭時弊、批評政府某些施政措施的用意和目的，欲藉五四精神之古以解放當前制度上之各種桎梏。這是五四愛國思想以外另一種透過激烈批判以表達其愛國目的的思想取徑。故我們需要了解到，當國家的五四進入了地方而成爲地方的五四，則生活在地方一隅的知識社群將各按所需，或擷取五四的精神

⁶⁵ 〈學民思潮——反對德育及國民教育科聯盟聯合聲明〉，學民思潮 Facebook，網址：<https://www.facebook.com/notes/學民思潮-scholarism/學民思潮-反對德育及國民教育科聯盟-聯合聲明/211871565511924/>，檢索日期：2019年1月18日。

價值以推動地方的社會變革，或於在地發揮五四精神以批判國家。

時到今天，香港回歸中國大陸已逾二十年，但人心還是沒有隨著政權的回歸而回歸。關於香港人的國家意識、國民身分認同或愛國愛港的問題，來自國家的聲音或者是來自社會形形色色的調查，近二十年來從未停止。圍繞著一國兩制的問題，不同背景的人都在各執一詞。對於國家而言，目前已是「一國」大於「兩制」和先於兩制；但在一國兩制的論述之下，香港的百年歷史發展形成的差異性與獨特性卻不被看重。而對於部分香港人而言，則只要兩制而亟欲排除一國。在今天，任何觸及香港固有生活傳統或法制底線的事件，或者是任何維護香港固有生活傳統或法制底線的行為，都必然會被雙方某些人上升為對抗的行動，使之成為一國與兩制之間沒有妥協的攻防戰。陸港的差異、對立乃至分離也因此而被進一步擴大。⁶⁶

從五四提供的視角裡，我們正好清晰看見，粵港的百年深層互動或者是香港社會構成的歷史問題，在今天是如何地被去歷史脈絡化以及是如何地被高度簡單化；而一切具備批判黨國體制的思想資源與歷史遺產，在言論自由而當下甚為躁動不安的香港一域，均會引人注目。甫踏入2019年，香港各界便密鑼緊鼓地籌備五四運動紀念活動。可以預見的是，從學術界到各大報刊、電子媒體，又或者不論是親建制的親中團體還是泛民主派的反對黨，將會比過往更加踴躍地挪用五四思想資源與歷史遺產，各為當前的政治形勢服務。

那麼，透過五四怎樣地、如何地「在」香港，又或者是它在香港發揮了什麼樣的功效，帶來了什麼樣的社會迴響等，確實讓我們看見本源於國家層面的事件如何於在地化的過程中成為一套知識論述，並由此反映詮釋者、敘述者的在地思想關懷。不難看見，「五四」的「在」香港的「在地化」面向，實際上也就是一批批不同時期的南來者或流亡者在香港異域的在地化過程中思考自身與國家何去何從問題

⁶⁶ 相關論述詳見拙文：〈香港的城市變貌與思想困局〉，頁63-91。

的思想反映；同時，這一「在地化」發展，也反映了大陸政權在回歸以來如何一步步介入香港社會政治文化進程裡，不斷遭受不再是「異域」但在感情上卻愈來愈疏離的地方反抗，進一步促進了多元複雜的五四在今天的發展，而香港的多元性和複雜性也由此被展現得淋漓盡致。這種展現，讓我們看見了一個早在百年前便被陳伯陶、賴際熙、何藻翔、汪兆鏞（1961-1939）等前清遺老看作是中原流亡者的「世外桃源」，因與國家在時空發展上的步伐不一，而其地其民的南下流亡者、逃難者印記所疊加而成的文化中國與政治中國對立的歷史記憶，均讓百年來陸港間既緊密亦疏離的複雜情感不斷地隨著政局波動起伏，構成彼此在思想上、文化上存在著連續性的同時也有難以彌合的差異性與對抗性。

六、結語

香港的百年殖民史經驗與生活情境，造成了在政治體制、司法制度等與內地相異，致使社會教化、意識形態等等也必然難以相互等同。當然，連續性與差異性並不是相互對立的。對於一個國家而言，彼此之間是連續性中有差異性，差異性之中有其連續性。香港過去百年來的人口增長、文化風俗之構成乃至上層的知識傳播，無不與大陸的南來因素有關。從古至今，香港的主要社群主要是由源源不絕的南來者／流亡者或移民潮所構成，他們因應內地的政局轉變，把自身生活文化習慣或與國家相抗而堅守不移的政治異見帶來香港。當然，在人們離開自己土生土長的土地而來到香港後，自然會在一些生活習慣或知識行為上，受到在地的固有生活習俗或其他社群的影響而相互滲透、相互交融，由此而再衍生出新的文化風貌。

隨著香港與中國大陸的歷史「流變」，「五四在香港」也同樣不斷地出現其「本土化」或「在地化」的流變情況。其關鍵之處，在於不同的人來到香港後，往往因應國家政局的轉變或時代的轉型，或借

五四這個酒杯以澆心中的塊壘，排遣中國文化命運與己身文化理想之不濟；或以五四為今時代打鬼之鍾馗，用之以打擊敵對勢力以伸張自身的文化、政治理念。總言之，五四運動成為不同背景的力量或群體欲以改變當前社會或為民族國家開創出路的精神旗幟，同時也成為不同的人在檢討中國國運興衰時的起點與終點。

不難看到，國家的五四進入地方而有其千姿百態的在地化發展，其結果也一定是不完全相同於國家的五四。五四在眾聲喧嘩中所呈現的繽紛面相，實際上透現著不同思想背景的人在對百年中國發展的不同角度及不同層次的反思與展望。我們在五四紀念的場域裡，往往也得以看見當下社會思潮流變裡的時代精神病痛，致使五四運動一直以來都成為在地知識社群瞭望國家民族何去何從的精神燈塔。五四也因為作為現代中國之分水嶺與歷史起源，以致每年周年紀念均成為香港或海外知識社群為故國招魂的別具意義的時節；同時，它也是華人社區裡每當抗衡政權宰制而捍衛自主、自由、自治與獨立的精神價值時所高舉的革新、求變旗幟。⁶⁷ 在這一點上，過去如此，在可見的將來恐怕亦復如是。

⁶⁷ 關於這點，最近可見的例子就是2018年5月初圍繞臺灣大學校長遴選而發起的「捍衛大學自治，守護學術自由」罷課、示威抗議運動，它們被臺灣政界、學界中人喻為「新五四運動」。〈6千人參加「新五四」成大、政大呼應〉，《聯合報》，2018年5月3日。

徵引書目

- 〈6千人參加「新五四」成大、政大呼應〉，《聯合報》，2018年5月3日。
- 〈五四大遊行〉，《華僑日報》第1張，1989年5月4日。
- 〈五四運動七十周年〉，《華僑日報》第2張，1989年5月4日。
- 〈孔聖堂總務部會議情形〉，《華僑日報》第2張第1頁，1930年1月16日。
- 〈孔聖會本年義學近況〉，《華僑日報》第4張第2頁，1927年2月28日。
- 〈孔聖會祝孔特紀：香港孔聖會祝聖情形〉，《華僑日報》第2張第3頁，1926年10月5日。
- 〈我們誓與青年們站在一起〉，《國民日報》第4張，1946年5月15日。
- 〈紀念五四運動七十周年，五千多名大專學生遊行集會場會壯觀〉，《華僑日報》第5張，1989年5月5日。
- 〈要把「五四」復活〉，《中國學生周報》第41期第1張，1953年5月。
- 〈堅毅實踐總結多方創造一個更新時代〉，《華僑日報》第6張第2頁，1983年3月4日。
- 〈教育界六次早餐會，回溯五四期勉中興〉，《華僑日報》第9張，1989年5月13日。
- 〈報效孔聖會堂地之熱心〉，《華僑日報》第2張第3頁，1928年4月27日。
- 〈學生遊行浩浩蕩蕩，市民夾道沿途圍觀〉，《華僑日報》第3張，1989年5月5日。
- 小思編：《香港的憂鬱——文人筆下的香港（1925-1941）》，香港：華風書局，1983年。
- 文：〈五四由沙田步行至尖沙咀渡海抵中環，學聯與十三大專院校大遊行支持內地學運〉，《華僑日報》第1張，1989年5月2日。
- 王汎森：〈五四運動與生活世界的變化〉，《二十一世紀》第113

- 期，2009年6月，頁44-54。
- 王汎森：〈從新民到新人——近代思想中的「自我」與「政治」〉，《中國近代思想史的轉型時代》，臺北：聯經，2007年，頁171-200。
- 王德威：〈香港——一座城市的故事〉，《如何現代，怎樣文學？》，臺北：麥田，1998年10月，頁279-305。
- 平：〈民主的實踐——「五四」五十周年紀念會側記〉，《中國學生周報》第877期第1張，1969年5月。
- 余英時：〈赴香港「吸取自由空氣」——〈香港與新亞書院〉之一〉，《明報月刊》2018年1月號，頁18。
- 吹風：〈香港的書店和學生〉，《華僑日報》第1張第1頁，1926年12月15日。
- 李默：〈五四的省思〉，《華僑日報》第16張，1989年5月12日。
- 杜贊奇著，王寵明譯：《從民族國家拯救歷史：民族主義話語與中國現代史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年。
- 肖其：〈從大方向到現狀與個人〉，收於香港專上學生聯會編：《香港學生運動回顧及檢討》，香港：廣角鏡，1983年，頁178-179。
- 周拱照：〈香港學生該學「生」了〉，《微明》1928年第1期，頁14-16。
- 林志宏：《民國乃敵國也：政治文化轉型下的清遺民》，臺北：聯經，2009年。
- 金耀基：〈「五四」與中共的學潮〉，《香港時報》第6張，1989年5月8日。
- 香港專上學生聯會：〈關於中國民主前途的「五四」宣言〉，《七十年代》，1981年6月，頁14。
- 原野：〈中國學生運動的任務〉，《達德青年》1947年第2期，頁10-11。
- 唐君毅：〈中國現代社會政治文化思想之方向，及海外知識分子對當前時代之態度〉，《唐君毅全集第14卷·中華人文與當今世界（下）》，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92年。

- 唐端正：〈我們的新任務〉，《中國學生周報》第41期第3張，1953年5月。
- 孫受匡：《熱血痕》，香港：虞初小說社，1923年，頁59-70。
- 殷惠敏：〈「五四」的迷惘〉，《七十年代》，1983年5月，頁60-61。
- 高嘉謙：《遺民、疆界與現代性：漢詩的南方離散與抒情》，臺北：聯經，2016年9月。
- 區志堅：〈發揚文化、保全國粹：學海書樓八十年簡史〉，《學海書樓八十年》，香港：香港學海書樓，2003年，頁17。
- 梁燕城：〈香港五四學潮紀實〉，《信報》第29張，1989年5月9日。
- 陳國球主編：《香港文學大系·評論一》，香港：商務印書館，2016年。
- 陳學然、吳家豪：〈香港華商總會對「五四」在地化的迎拒〉，《杭州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五四」百年特輯），預計2019年第3期刊登。
- 陳學然、韓子奇：〈金文泰治港時期的政學商互動及其對五四新潮的排拒〉，《新亞學報》，2019年3月通過刊登。
- 陳學然：〈百年運動 莫忘初衷：學生與學死〉，收於周佳榮、黎志剛、區志堅編：《五四百周年：啟蒙、記憶與開新》上冊，香港：中華書局，2019年5月，頁113-134。
- 陳學然：〈香港的城市變貌與思想困局〉，《思想》第31期，臺北：聯經，2016年9月，頁63-91。
- 陳學然：〈唐君毅對「五四」的詮釋〉，《鵝湖》第359期，臺北：鵝湖雜誌社，2005年，頁44-57。
- 陳學然：〈道統庚續與五四批判：錢穆學思管窺〉，《錢穆研究暨當代人文思想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錢穆故居管理處，2010年，頁181-210。
- 湘：〈15專上校講師宣揚五四精神，紀念五四街頭演講，市民支持中國學運，即場捐款表心意〉，《華僑日報》第5張，1989年5月5日。

- 陳學然：《五四在香港：殖民情境、民族主義及本土意識》，香港：中華書局，2014年。
- 程中山編：《舊體文學卷》，收於陳國球主編：《香港文學大系》第9卷，香港：商務印書館，2014年。
- 黃枝蓮：〈是更上一層樓的時候了！紀念「五四運動」七十周年〉，《華僑日報》第5張，1989年5月6日。
- 熙：〈梁永燊談五四運動愛國愛民，爭取民主科學七十年未成功〉，《華僑日報》第1張，1989年5月7日。
- 碧痕：〈文學革命〉，《華僑日報》第1張第1頁，1927年2月25日。
- 趙雨樂：《近代南來文人的香港印象與國族意識》，香港：三聯書店，2016年。
- 蔡元培：〈對於新教育之意見〉，《蔡元培全集·第2卷（1910-1916）》，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頁136。
- 蔣夢麟：《西潮·新潮》，長沙：岳麓書社，2000年。
- 鄭宏泰：《虎豹家族——起落興衰的探索和思考》，香港：中華書局，2018年。
- 鄭樹森、黃繼持、盧瑋鑾編：《早期香港新文學資料選（1927-1941）》，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1998年。
- 魯迅：《魯迅全集》，香港：香港文學研究社，1973年。
- 澤川：〈遊港雜記〉，《語絲》第4卷第42期，1928年10月，頁30-36。
- 賴際熙：《荔垞文存》，香港：學海書樓，2000年。
- 鍾士元：《香港回歸歷程：鍾士元回憶錄》，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1年。
- 鄭國明：〈論中國人在香港之歷史責任——所感於六月二日晨讀唐君毅先生之文者〉，《新亞學生報》1973年3月第1期，頁11。
- 懷國：〈重創五四精神〉，《中國學生周報》第668期第3張，1965年5月。
- 〈學民思潮——反對德育及國民教育科聯盟聯合聲明〉，學民思

潮 Facebook，網址：<https://www.facebook.com/notes/學民思潮-scholarism/> 學民思潮 - 反對德育及國民教育科聯盟 - 聯合聲明 /211871565511924/，檢索日期：2019年1月18日。

香港中文大學大學圖書館編：《香港文學通訊》第50期，2007年9月24日。網址：<http://hklit.lib.cuhk.edu.hk/news/iss50.jsp>，檢索日期：2019年11月29日。

Personal Letter, Sir Cecil Clementi to L. S. Amery. 26th March, 1927.
Papers of Sir Cecil Clementi, Box 19 /File 3.